

# 中国民族学田野 工作反思

——以五六十年代民族大调查为例

◎ 谢燕清

民族学与人类学同体异名,从西方来说,民族学一般指的是欧陆传统,而人类学指的是英美传统。1949年以前的中国大体上也是遵循了这个区分,从学者各自选择的学科称谓上大致可以判断其学术背景。之后,随着中国的政治形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学因其英美传统而逐渐销声匿迹,该学科按照苏联民族学的模式被改造成中国民族学,确切地说,苏联民族学是欧陆传统里的俄国民族学改造后的产物,中国民族学基本是在苏联民族学的框架里搭建的。<sup>①</sup>本文拟从田野工作的角度考察中国民族学,希望能对全面评价中国民族学有所助益。

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大体分三个阶段:从1949年到1966年的改造和发展阶段,1978年到1992年的恢复阶段,中间是停顿阶段,乏善可陈。恢复阶段的中国民族学主要是在第一个阶段的基础上重新完善,没有本质的进步。第一个阶段中国民族学主要做了两件工作,即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状况调查,可以说,中国民族学1992年以前的发展基本上是在这两个调查的基础上的;因此审视一下这个时期的田野工作,对客观评价中国民族学尤为重要。<sup>②</sup>

1999年出版的《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提供了中国民族学



界当事人的大量回忆, 本文将以这本书为基础探讨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的特点。<sup>③</sup>

首先, 民族大调查的产生乃是一项政治行为。如何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 新中国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 这一设计不同于联邦制和加盟共和国制, 它的基础是在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其级别视规模而定, 从省、自治州、县到乡不等), 同时在各级人大、政协以及政府部门中留下相应比例的位置。政治权力的分配和落实首先以民族身份的确定为依据, 而当时中国自报的民族有 400 多个, 这种情况自然会使得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成本大大提高, 民族识别的主动权自然要掌握在党和政府手里。所以最先推动民族调查的是党和政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需要。

除了政权建设的原因, 社会改造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于汉民族地区, 党已经有了明确的判断, 那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就各不相同, 且宗教文化差异很大, 移风易俗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方案也要因地制宜, 而这一切也有赖于民族调查, 于是早期的民族识别很快就转而成为更加全面的社会历史状况调查。确切地说, 就是要确定具体的民族地区处于斯大林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sup>④</sup>的哪一个阶段, 从而为社会改造提供依据。

其次, 五六十年代的民族大调查是由国家民委出面组织, 各级党委具体指导, 因而调查组的面貌完全是政府工作队的状态。福建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由福建省民政厅民族事务处处长白子文任组长, 施联朱、陈国强任副组长, 陈国强兼任党团支部书记, 调查组在当时的中共闽东统战部荆部长的指导下展开调查。革命战争时期的将党组织建立到连队的作法, 在夺取政权后, 就扩大为将党组织渗透到社会的毛细组织, 全面实现党的领导, 像调查组这样的临时组织也不例外。因此, 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和工作作风也带入调查组。从民族调查队的《工作队员十大守则》的内容看, 几乎是共产党军队的“三八作风”的翻版。<sup>⑤</sup>在组织面前, 个人自由是不存在的, 詹承绪回忆说: “服从组织分配、不计较个人得失, 这是当年在民族调查组工作必须遵守的纪律和原则。那时候, 对组织分配的调查任务, 是要当成命令来执行的, 叫你什



么时候走就得走,没有讨价还价一说。”

在这种组织原则下的调查活动里,个人的自由完全受到忽视。各调查组刻意压制调查人员的个性,不准个人保留笔记,不准超越统一的调查提纲。其目的很明确,调查是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的,哪里容得个人在里面搭便车。李干芬回忆说:“调查组规定,为防止个人搞小仓库、撰文出书、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调查的笔记本一律交出,不得私留。庆幸的是,这段生活再劳累,我也写下日记,并保留至今,才有根据写下此文。”宋兆麟干脆指出:“有的调查组否认调查者的个性和专长,一律按提纲找答案,使创造性受到压抑,连调查人员的笔记本都要上交,消极作用很大。”这对有专业意识的人来说,无疑是非常痛苦的事。

三同原则从字面看,作为参与式观察方法的一种概括未尝不可,但在民族大调查的实践中,这一操作给调查人员的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范宏贵回忆说:“规定调查期间要与群众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每人每天至少收集1000字资料,每年参加劳动要有100个工分,每人有一本劳动工分手册,每次劳动后由当地生产队队长签章。”范抱怨劳动强度太大,调查任务重,吃不饱。有一次他和另一个人用粮票买了1.6斤米,一两酒,一点豆酱,偷偷煮了,居然吃了个精光,至今记忆犹新。<sup>⑥</sup>

第三,外在政治因素对民族大调查影响极大。这很好理解,前面我们说到,民族大调查本身就是一项政治行为,其组织特点又党团化,更加容易受到外界的政治影响。李干芬指出:“1958年秋,民族调查工作在全国各省(区)全面铺开的时候,一股强劲的‘突出政治’的极左思潮由首都北京向各调查组吹开了,而且吹得特别猛。谁要是在调查中染指古代民情风俗的材料,就被扣上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脱离政治的大帽,搞得人心惶惶。”于是,在具体调查中厚今薄古,建国以后反映社会进步、形势喜人的资料应有尽有。武自立回忆他在调查彝族传统文字老彝文时遇到的重重阻力。彝族祭司——毕摩懂老彝文,但大跃进以来,毕摩们成了破除迷信的对象,受到迫害和监管。武自立到云南禄劝县,主管文化的副县长一开始阻挠,后来才勉强同意。武到了皎西区,区长十分冷淡地接待了他,并派公安特派员陪同武调查,实际是监视



他。木玉璋的经历就更惨,1958年怒江人民政府制造了“反革命裴霜集团”的冤案,牵连许多人。木玉璋等人也被集中看押,非打即骂,受尽羞辱。关押期间,他们收集的语言文字资料失散。<sup>⑦</sup>

民族大调查田野工作的特点概括起来说,就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一项肩负明确政治任务的调查活动,组织上是采取调查队分区协作的方式,采用统一的调查提纲,调查时间短,调查人员的个人自主性差,调查是在既定的政治教条的框架里进行的。

调查中确实有老一辈受过正规人类学教育的学者参与,而且还是指导人,但由于诸多因素,建国初的思想改造使得许多学者纷纷向苏联民族学靠拢,以后的反右拔白旗则剥夺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一方面党培养的又红又专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于是老专家逐渐靠了边,而民族大调查也逐步脱离了规范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模式。林耀华先生作为知名的人类学家,1949年后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并加入共产党,可谓是当时旧知识分子洗心革面的代表,但本着深厚的专业素养他对民族大调查的田野工作评价甚低,“在中国这种参与观察并没有真正实行,尽管50年代曾以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为口号激励过民族学工作者,但由于受各种条件的制约,真正的民族学参与观察至今仍是纸上谈兵,充其量,我们所做到的‘参与’还停留在局部范围、短期阶段上”<sup>⑧</sup>。这大体上体现了老一辈西式教育出身的人类学家对民族大调查的田野工作的评价,也就是说这样的田野工作总体上来说是不入门的,达不到相应的学术标准。

刘锋指出,由于50年代的民族调查是由党和政府组织的,调查者的生活和活动都按照调查团的统一安排,进行集团管理,个人活动的余地不大。调查手段仅限于访谈和座谈会,调查组事实上游离于调查对象之外。在尊重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口号下(还有捉摸不定的政治运动的威胁),调查者大多采取息事宁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漠视、回避调查对象。

田野工作本身的节奏也受到外界的政治运动的影响,满都尔图指出:“1958年6月召开的调查工作会议,是导致调查工作方针偏向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突出阶级斗争,强调民族研究工作中的两条路线的



斗争,‘拔白旗,插红旗’,随后又以歌颂‘三面红旗’为主旨,决定在一年内完成《中国民族自治地方概况》《各民族简史》《简志》等三套丛书,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为此,各调查组疲于奔命,放弃正常的调查工作,到处收集资料。严酷的事实是,国庆十周年时不仅没有献上礼,连一本成熟的书稿都没有拿得出来。”<sup>⑨</sup>

反右和大跃进使得民族大调查根本没有一个适当的学术氛围,除了这些政治因素以外,新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也不可忽视。当时,在所有学科中,历史学受到特别重视,中国历史的研究根据斯大林社会发展史的五阶段论进行了改造,即突出阶级斗争历史、尽量按照五阶段论重写中国历史,从而论证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实用主义史学也波及到民族大调查,在调查中突出阶级斗争、强调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辨别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状况,为跨越式的改造运动提供依据。

民族大调查的成果最直接的体现是三套丛书,其质量如何呢?我们看看它是怎么完成的。纪大椿回忆新疆调查组在自治区党校借了一层宿舍楼,集中工作。“这一阶段的工作相当乏味。天天坐下来讨论书稿,一本接一本,越讨论越觉得可笑。除了史的部分之外,志的部分都是大同小异,只要把地名、族名、人名换一换,竟是可以互相通用的。于是又回头来讨论民族史和民族志该不该有特色,怎样才能写出特色。讨论的结果是调查不够深入,抓不住民族和地方的特点,需要做补充调查。而在此之前却又将能反映民族和地方特点的材料斥为‘猎取奇风异俗’、资产阶级民族观在学术研究上的表现。我们把握不住这两者之间的分寸,左右为难。”<sup>⑩</sup>

三套丛书品质低下的原因,参与者李干芬说,当时他们加班加点在国庆前赶写出壮、瑶、仫佬、毛难四个民族的简史简志初稿,敲锣打鼓向自治区人民政府报喜。“但是这些丛书初稿到底有多大价值?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从《壮族简史》于80年代初交付出版时,经过九次修改补充才勉强付印来看,可知当时为抢时间而粗制滥造写成的初稿,质量是很低下的。造成这个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一部民族简史,时间跨度长,材料缺乏,学术性强,怎么也不能用突击任务来完成;二是没



有系统研究为基础,民族源流、社会发展、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等内容根本没有研究,就匆忙编写书稿,势必落得个空洞无物、粗制滥造、肤浅皮毛的结果;三是没有发挥专家教授的作用。记得我们在编写大忙期间,没有老专家教授参与。杨成志、汪明珪两位正副教授在农场养鸭,刘介、唐兆民、石仲健三位老专家教授也靠边站。编几册简史简志丛书初稿,光靠一批年轻的学者凭热情去完成,质量不高自然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事。”<sup>⑩</sup>

这样,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指出,三套丛书的编写精力都放在“紧跟上”,脱离了实地调查,“偏离正道了”。而作为三套丛书的买家,邓力群也表达了党和政府对民族大调查成果的不满意,说到底都是千人一面,“这样的书谁看?恐怕谁也不看”<sup>⑪</sup>。于是又有了民族问题五套丛书,基本上是以民族大调查为基础积累的资料回炉再造,实质上否定了三套丛书的存在意义。

要言之,中国民族学的田野工作特点从民族大调查就能反映出几个关键问题。首先是田野工作不符合现代人类学的标准。行政化的团队组织使得调查成为一种程式化的行为,调查者本身的身份也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被调查对象分不清调查队和工作队的区别,而调查队有时候兼负了工作队的职责,一边做调查,一边参与执行一些政策。事实上,由于建国后国家的社会阶层的重新划分,出现了一种“干部”编制的阶层,而知识分子尽管遭受到各种政治歧视,但编制上大多数都还是“干部”,至今下去做调查,仍然被农民看成是(行政)上边来的人。其次,调查技术上采用的是毛泽东式的调查方法,而不是学术意义上的调查技术,收集的资料很难在学术意义上使用。第三,调查者本身的素质,除了我们知道的老专家靠边站,新中国培养的速成人才在知识结构上存在着巨大缺陷,一开始接受的是苏联的民族学,随着中苏翻脸,转而孕育出一种比苏联民族学还要僵化的教条模式,摩尔根、恩格斯、斯大林成了惟一的理论来源。第四,在编写民族志时,采取的是集中讨论、分头撰写和汇总的方式,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气氛下,这种集体写作的方式一方面压抑了研究者个人的思想,同时更便于贯彻僵化教条的社会发展史模式,对于研究者这是寻找某种安全感的办法,而对领导者



而言则满足了统一思想认识的需要。

结果造成了中国民族学研究视野狭窄、趣味单调、理论层次低下的局面。从 80 年代以来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辑出版的《民族学研究》系列来看,中国民族学基本上是五六十年代形成的毛泽东模式的延续,选题局限在讨论民族起源、发展阶段(社会性质)、摩尔根—恩格斯的家庭和婚姻制度、民族政策研究等问题上,学术语言基本上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套术语,征引的理论依据也主要是摩尔根、恩格斯和斯大林三人,对西方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动态不甚了了,态度上还停留在姓社姓资的取舍上。徐杰舜指出:“无须讳言,我们这一代民族学者是在苏联斯大林的民族理论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我个人的研究过去受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影响很深,这在我撰写的《汉民族发展史略》和《从原始群到民族》以及《中国民族史新编》中都留下了很深的烙印。这种受斯大林民族理论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民族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刻板性,人们不是从社会实际中去提炼、概括和升华理论,而是把民族学当作一个公式去套用。这一点在民族问题理论的研究上特别突出,所以尽管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有近 20 种不同版本的教科书,但除了体例上的不同外,大多是你抄我,我抄你,都是一样的‘麻子哥’。所以 90 年代以后,民族问题理论的发展像走进了死胡同一样,很难进行创新了。”这里,徐杰舜再次点明了中国民族学的两大要害,一是缺乏规范的田野工作,二是理论匮乏,仅有一些僵化的理论教条。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国人类学界发生的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是国外留学归来的学者将西方的学术规范和研究成果引进,另一方面是国内的中国民族学开始向国际学术规范靠拢。

#### 注释:

①岑家梧:《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 1992 年版。

②顾定国著,胡鸿保等译:《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夫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③郝时远主编:《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④林耀华:《林耀华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⑤刘锋:《民族调查通论》,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6 年版。



- ⑥乔健主编:《社会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1998年版。
- ⑦施宣圆:《人类学本土化的必由之路——访广西民族学院汉民族中心主任徐杰舜教授》,《文汇报》1999年10月30日第8版。
- ⑧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下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 ⑨王铭铭:《汉学人类学—西学“中国化”的历史问题》,《王铭铭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 ⑩汪宁生:《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 ⑪吴文藻:《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 ⑫吴泽霖:《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 ⑬谢燕清:《马林诺夫斯基与现代人类学工作方式》,《民俗研究》2001年第1期,第132—143页。
- ⑭杨堃:《杨堃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 ⑮中国民族学会编:《民族学研究》(第三辑)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
- ⑯中国民族学会编:《民族学研究》(第四辑)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
- ⑰中国民族学会编:《民族学研究》(第五辑)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
- ⑱中国民族学会编:《民族学研究》(第七辑)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
- ⑲中国民族学会编:《民族学研究》(第八辑)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 ⑳王建民等:《中国民族学史·下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7—105页。
- ㉑1953年到1956年开展民族识别工作,1956年到1964年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这两次调查在时间上前后接续,又被笼统地称为民族大调查,1964年后,国家的政治形势越来越动荡,正常的工作几乎都停顿下来;所以民族大调查几乎是中国民族学田野工作的全部。
- ㉒中国民族学又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学界的构成人员有点复杂。准确地说,属于中国民族学的那批人是在1949年以后在新中国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在民族大调查中成长起来的学者,这批学者的地位和成就与民族大调查是紧密联系的。1949年以前的民族学者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从延安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代表党来接受和改造人类学,自然也属于中国民族学;另一类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数在西方拿的博士学位,受过比较完整的西式教育,接受的是西方的学术标准,西方人类学的各个流派在中国都有其传承人物。这些西式的知识分子大体上确立了其学术地位,尽管1949年以后其学术成就受到否定和批判,但在1992年以后的学术转型中,他们1949年以前的成就仍然奠定了他们在中国人类学史上的地位。而中国民族学的经历对他们而言,更多的是学术的荒废和屈辱的回忆。所以,在面对1992年以后的学术转型构成的对中国民族学的评价上,不同的人心态是不一样的。
- ㉓这五阶段分别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应该说,这里的社会类型乃是一种理想类型,毛泽东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在一种介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某种状态。
- ㉔①服从上级领导,坚决执行政策,严格组织纪律,团结互助,克服困难,完成任务。②发扬民主作风,反对自由主义,开展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③努力学习民族语言与各民族人民





交朋友,要善于发现和培养各民族优秀干部。④遇事反复协商,征得上级同意、群众拥护就积极认真去做。⑤只做各族广大人民欢迎的好事,不做群众不欢迎的事。⑥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⑦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物要还,损物要赔。⑧买东西一定要公平,不占便宜;不强迫群众使用人民币;未经上级批准,不许随便买外国货。⑨不贪污、不浪费、不敲诈、不打人骂人,不调戏妇女。⑩多请示汇报,严格保密制度。”见《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第67—68页。

⑮《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第37、241、578、234页。

⑯《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第229、170页。

⑰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147页,转引自刘锋:《民族调查通论》,第92页。

⑱《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第558—559页。

⑲《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第506页。

⑳《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第231页。

㉑费孝通:《关于编写〈民族自治地方概况〉的一些意见》,1980年11月28日,“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工作会议。邓力群:《科学大厦的基石》,《光明日报》1980年7月9日第3版。转引自《中国民族学史·下卷》,第202页。

(谢燕清: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博士生)

